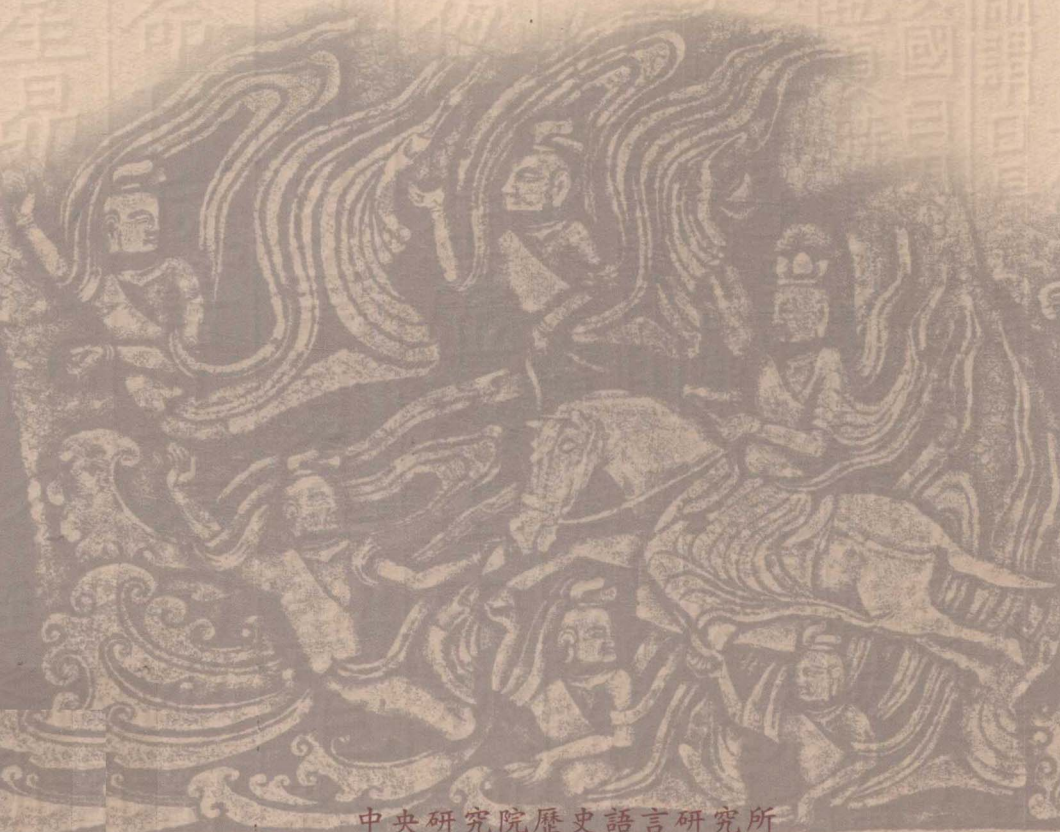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中世紀以前的 地域文化、宗教與藝術

邢義田 主編

歷史組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中世紀以前的 地域文化、宗教與藝術

邢義田 主編

歷史組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中世紀以前的地域文化、宗教與藝術 / 邢義田
主編. — 臺北市：中研院史語所，民 91
面；公分
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組）
ISBN 957-671-861-9 (精裝). — ISBN 957-671-862-7 (平裝)

1. 藝術 — 中國 — 歷史 — 論文, 講詞等

909.207

91008881

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組 中世紀以前的地域文化、宗教與藝術

主 編：邢義田

出 版 者：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發 行 者：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30 號

印 刷 者：永登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市永和路 65 號

展 售 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T: 886-2-2782-9555#245 F: 886-2-2786-8834

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臺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138 號 10 樓之 1
T: 886-2-2321-9033 F: 886-2-2356-8068
Email: Lexis@ms6.hinet.net

四分溪書坊
臺北市南港區中央研究院活動中心地下室
T: 886-2-2783-9605 F: 886-2-2783-9620
Email: kk1133@saturn.seed.net.tw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新界沙田
T: 852-2609-6508 F: 852-2603-7355
<http://www.chineseupress.com>

定 價：平裝 新臺幣 370 元
精裝 新臺幣 420 元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出版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總 序

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於公元二〇〇〇年六月廿九日在臺北南港院區學術活動中心揭幕，會期前後三天至七月一日閉幕。這一次漢學會議的舉行距離於一九八六年召開的上屆大會已有十四年之久，而與第一屆大會的舉行則已相隔廿年的時間。在這樣一段長久的時間內，國內外漢學界已有相當的成長與變化，正如本院李遠哲院長在開幕致詞中所說的：「在多元觀點、多元材料與利用新科技工具的研究趨向下，近年來國際漢學研究的視野更趨於寬廣，出現許多新主題、新理論與跨學科的研究成果。」因此本院「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乃結合人文學科各研究所，經兩年時間的籌備而召開本屆大會，其目的即是希望藉這一擴大的學術聚會，讓國內外漢學界研究同仁再有一次廣泛討論及交換意見的機會，以便共同探討籌劃「漢學研究在廿一世紀的新方向」。

第一、二兩屆國際漢學會議是由本院的三個人文學科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與民族學研究所共同參與舉辦。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參加籌備的單位除去上述三個研究所之外，又增加了中國文哲研究所與語言學研究所，而在「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的委員中亦邀請多位國內大學相關學門的教授參與。在會議內容的分組上也有變動，第一屆會議共分為六組，第二屆會議則改為五組，本次會議則增加為歷史、文學、思想、文字學、語言學、族群關係（人類學組一）、信仰與生活（人類學組二）等七組之外，並有「漢

籍數位典藏研討會」合併在會議中舉行，以展示本院推動現代資訊科技在漢籍典藏與搜集上的應用成果。在會議節目程序的安排上，本屆會議也略有創新，除去有兩次大會特別演講外，並有十四次「主題演講」以配合各組之下再分出的研討主題，分別邀請與主題相關的資深學者作演講，以突出並導引各研討主題的意義與研討。最後各組並各有一場綜合討論，以整合各領域研討的意見。

本屆大會共有國內外漢學研究者三百餘人與會，提出論文二百一十一篇。前兩屆漢學會議均將會議論文分組編印成冊出版。本屆會議各主題下之論文都具相當專業性與系統性，籌備會與各組主持人均希望早日刊出。茲為編輯會議論文出版事務，特由「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邀請其副秘書長，現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黃寬重教授及執行秘書、史語所副所長王明珂教授，分別擔任召集人與副召集人，與各所代表何大安、何翠萍、黃克武、李豐楙、邱澎生等教授共同組成編輯小組主持編輯出版事務。邱澎生兼任此編輯小組秘書，與助理李雅玲小姐共同襄理協調聯繫事宜。各分冊之主編則由劉翠溶、石守謙、邢義田、劉增貴、臧振華、陳國棟、黃克武、鍾柏生、何大安、何翠萍、蔣斌、林美容、李豐楙、劉述先等教授分別擔任。本屆大會論文集在經費困難與出版形式之議定極費精神的情況下得以陸續出版問世，都是編輯小組同仁與各分冊主編共同努力的成果，在此本人特代表「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向他們表示至深謝忱。

本屆國際漢學會議得以順利召開與完滿達成，首先要感謝本院李遠哲院長與楊前副院長國樞的大力支持與鼓勵，同仁們均十分感激。「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的委員，包括石守謙、李壬癸、呂芳上、徐正光、張玉法、黃俊傑、黃啓方、黃應貴、劉述先、劉翠溶、鍾彩鈞、戴璉璋、龔煌城諸教授，在籌備期間極備辛勞，而大會秘書處在黃寬重與王明珂兩位教授的領導下，在開會期間更是日夜不休

地工作，更是令人欽佩，本人與大會籌備會副主席杜正勝院士謹代表「漢學研究推動委員會」及與會漢學界同仁也向他們敬謹表示衷心感謝之意。

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籌備會主席

李亦園 謹誌

2001.12.

編者序

本編共收論文七篇。這七篇論文大致可分為三組：第一組有羅森（Jessica Rawson）、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和陳芳妹的三篇。這三篇從三星堆文化、西周青銅器的地域與多樣發展到秦漢禮器的變化，可以大致表現出近幾十年來，中國古代考古與器物藝術研究最具代表性的進展與課題。

自上個世紀中期，隨著科學考古發掘工作的進展，我們對商周銅器的認識有了極大的進步。這種認識可粗分為時間和空間兩方面。從時間上說，考古和古器物學者建立起了越來越精緻清楚的器物排隊，無論在鑄造工藝、器形、器物組合、紋飾或功能上，使我們能越來越有把握地判斷出土器物應有的相對時代位置。從空間上說，我們的目光不再釘在傳統的中原地區，開始認識到中原以外不同的器物文化傳統、地域間的差異和彼此的互動。

羅森的〈戰國至秦漢禮器的變遷〉一文即反映了時間和空間認識上的進步。本文主要指出戰國至秦漢禮器在質材、器類和性質上的重大轉變。上千年來居於主宰地位的青銅禮器，從戰國晚期以後到秦漢逐漸讓位給了漆器。鼎、壺、豆、簋等之器類雖然仍見延續，但是也看見耳杯、卮、尊等類的日常食器扮演了主導的角色。本文認為這一轉變可能主要是受到南方葬俗的影響。一方面是南方多漆器，另一方面是南方似乎在葬禮中更強調日常生活的一面。此外，以刻或畫取代明器，可能也是受到南方葬俗的影響。這對商周以來的傳統構成一項革命性的變化。此文另一具啟發性的貢獻是對過去

學者習慣性地將青銅和玉質器歸為禮器，將漆、木等器歸為日用器的區分方式提出質疑。日增的出土器物表明，漆、木早已作為禮器使用。作者認為從質材或器形區分禮器和日用器，不如從這些器物在墓室中的位置來分辨其功能更為有效。

四川廣漢三星堆「祭祀坑」的發現，像過去紅山、良渚文化一樣，促使我們必須大大重視古代文化的地域性。三星堆遺址的性質自 1986 年發現以來即引起討論的熱潮。在紛紜的眾說之中，羅泰〈對三星堆的一些反思〉一文企圖作一些根本性的檢討。1999 年《三星堆祭祀坑》的正式報告出版。〈反思〉一文雖然暫時接受一、二號坑為「祭祀坑」的說法，但從檢討遺址本身，一、二號坑內涵的同異，作者更傾向於僅中性地稱之為「器物坑」。本文並且認為依據千餘年後的文獻，說明三星堆文化和蜀國的關係應該更為謹慎。三星堆遺址的發現，目前最大的意義應在於為中國的銅器時代提供了一個新的主要的文化中心，突顯出大中華文化圈內社會的複雜性，幫助我們從傳統王朝歷史單線發展的限制中突破出來。

青銅文化的區域性和彼此間的關係，近年來已引起中外學者很多的討論。陳芳妹的〈時代與區域風格間的激盪〉是一篇從西周青銅藝術風格的多樣性及禮制發展，剖析背後變化原因的大作。作者企圖從藝術史的角度，從身份、空間和時間三項因素分析青銅藝術風格在時間上的變化和空間上的區域特色和相互間的關係。從時間看，西周早期和商後期已有不同。商代安陽是政治、青銅藝術和資源利用三者的中心，但西周早期的都會政治中心似乎並沒有像安陽一樣成為帶領青銅藝術潮流的核心。封建諸侯各領風騷，造成西周早期青銅藝術風格多元化的特色。基本上，脫離商代傳統和本土傳統是商周風格變遷及形成區域風格的主導力量。從侯國墓葬出土青銅器來看，墓主身份較高的明顯企圖以不同於商傳統的新風格和保留商傳統較多的身份較低者作區隔。但在器物組合和打破獸面紋的

主導地位的表現上，侯國青銅器仍有共通的「藝術語言」。西周中期以後，中原一帶代表商傳統的酒器已過時沒落，隨著禮制的規格化，青銅禮器由多元走向單一。

第二組較為孤單，只有邢義田的一篇討論漢代的畫像。本篇以一個失傳的「七女爲父報仇」的漢畫故事爲例，討論格套、榜題、文獻和畫像解釋的關係。基本上這是作者企圖從格套解析和榜題出發，爲建立一套畫像解釋方法一連串個案研究的一例。本文以山東莒縣東莞與內蒙古和林格爾漢墓「七女爲父報仇」的畫像和榜題爲據，推定山東武氏祠、孝堂山石祠、臨沂吳白莊漢墓、安徽宿縣褚蘭石祠相同畫像的主題，更正過去認識上的錯誤。接著強調石工在依據格套創作的同時，享有很大的發揮空間，不論在題榜形式或主題畫像的結構安排上，都可有無數的變化。此外，本文更指出不宜以現存的文獻與出土的畫像一味比附。漢代畫工和石匠在創作時，依據的很可能是民間口傳的故事。這些故事的版本和由上層士大夫掌握的文獻，不會完全一樣。

第三組集中在南北朝至七世紀的佛教人物與佛教造像。其中李玉珉的〈南北朝觀世音造像考〉和顏娟英的〈北朝華嚴經造像的省思〉都共同注意到佛教經典和造像之間密切的關係。觀世音信仰自三世紀末萌芽，南北朝時已十分盛行，相關經典近三十種。作者以蒐集的南北朝二六件觀音造像資料爲據，指出初期觀世音僅爲無量壽佛的脇侍，無特殊的圖像特徵；五世紀中葉以後，源自印度的蓮華手觀音成爲最具代表性的觀音造型。南朝藝匠另創造出我國特有的楊柳觀音圖像。這種觀音大大影響了北周甚至隋唐的觀音圖像。無論五世紀的蓮華手觀音或六世紀常見的施無畏觀音，都在彰顯《法華經·普門品》的精髓。從造像資料的區域分佈來看，河北、河南和山東最多，陝西、寧夏和山西等西北地區甚少且晚至北魏末才出現。六世紀上半葉的河北可以說是觀音信仰的鼎盛地區，這裡

甚至出現了《高王觀世音經》這樣的偽經。

〈北朝華嚴經造像的省思〉的作者從一趟到印尼中爪哇婆羅浮屠遺址的調查，引發起對《華嚴經》相關造像的省思。印尼的婆羅浮屠有豐富的圖像表現，惜缺乏相關的文獻；中國早期的佛教造像或許不如印尼所見的豐富多變，但有極豐富的文獻和題記。作者企圖利用豐富的文獻、題記和刻經等資料，了解中國早期華嚴經造像的發展過程。先論十地思想與華嚴經系的早期發展，再檢討敦煌四二八窟的法華經法身三界像、強調神通的人中像，接著以《華嚴經》和《觀佛三昧海經》相對照，指出二者都鼓勵眾生由禪坐觀想佛，以及當時造像莊嚴的表現必然和「觀佛」的殷切需求有關。論文後半部則在指出《華嚴經》在法身觀的形成上和《法華經》等有承接的關係。盧舍那佛形像的研究應結合唵佛見佛與觀想法門、末法思想，甚至《法華經》、《涅槃經》等圖像的流傳一併來考慮。以上兩篇論文都附有極完備豐富的資料表，表現出在造像和經典研究上的紮實功底。

最後一篇“Fazang and Śākyamitra, A Seventh-Century Singhalese Alchemist at the Chinese Court”，則是討論西元七世紀一位系出粟特家庭的華嚴大師法藏（643-712）和一位師子國僧釋迦彌多羅（Śākyamitra），如何在高宗、武周、中宗、睿宗、玄宗五朝宮廷內外「內弘法力，外贊皇猷」。本文主要依據崔致遠的〈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和其它記載，詳考法藏如何從師子國僧釋迦彌多羅受菩薩戒，使他有機會出入唐朝宮廷並使五臺山成為世界性的佛教聖地。作者又考證釋迦彌多羅是一位藥物專家，也可能就是道藏〈金石簿五九數訣〉中提到的婆羅門支法林。他往五臺山非僅為朝聖，禮拜文殊師利，也為鍊丹尋找硝石。這無意中為後來火藥的發明鋪排了道路。

本此會議原設計有「古代藝術的區域性」和「中世紀的宗教與文化」兩個主題。本篇收錄的七篇論文自然遠遠不能代表這兩大題目。不過在方興未艾的文化史研究的潮流中，宗教和藝術無疑是不可少的兩大支柱。宗教和藝術都不能脫離它們所存在的時代和空間環境。閱讀這七篇論文不禁使我聯想到以下幾點或許值得進一步思索的問題：

第一、中國宗教和藝術的文化史研究須要將視野擴大到中國以外。整個歐亞大陸的人群，在不同的歷史時段，都曾有過或疏或密的文化交流。不論中國古代的青銅藝術、漢代石刻壁畫或隋唐佛道造像和鍊丹術，其中都包含有或多或少中國以外的因素。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銅、陶器物即表明它的文化關係應不限於向東向北，也可能向西向南到今天的中國以外。西周方國多樣的青銅藝術是不是也可以找到「非華夏」的因素？漢代石刻壁畫藝術的外來因素還待深入開發。從印尼日惹的婆羅浮屠遺址想到中國的華嚴造像，這是一條開闊的思路。

第二、宗教和藝術的產生和流播固然須要大師級的人物、經典和握有權勢的贊助者，但是也須要一塊足以使這一切成為可能的基本土壤。我們的目光一向為光彩奪目的出土器物所吸引，不論三星堆的巨大青銅面具、西周成組的青銅禮器或隋唐莊嚴無邊的諸佛造像，往往使我們疏於問一聲這背後的作坊和工匠，牽連龐大的社會動員系統，以及足以使動員成為可能的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所謂一般知識不一定和目光所集的器物直接相關，如果沒有這樣的一般知識（例如對銅、錫等礦性質的認識，某些工藝的流程和技巧），這樣的器物根本不可能產生；所謂思想和信仰並不是指某大師的高論或某部經典，而是那些普遍存在的想法，足以促使造像成為芸芸眾生一生的心願。隋唐佛造像藝術之所以登峰造極，沒有權勢者的贊助固不可能，沒有真心發願的工匠也同樣不可能。我們須要認識

大師、經典和權勢所在的贊助者，也須要深深發掘這一片腳下的土壤。

第三、新的材料和新的眼光使我們逐漸覺悟到過去以爲的宗教、藝術或政治中心，往往不是真正的中心或唯一的中心，過去的邊緣也不一定是邊緣。長期以來中國上古史的研究是以中原爲中心，紅山、良渚和三星堆等文化的發現已澈底打破了這一個中心的神話。秦漢以前的荆楚南方一直被看成是邊緣，但是今天有誰敢再輕視長江上中下游在整個中國古代文明創造史上的地位？誰敢低估三星堆是另一個文化中心的可能？以六世紀觀世音的信仰地圖而論，邊緣的河北是中心，關中反而是邊緣。如果談到一般的知識、思想和信仰，不同時期和不同領域的中心和邊緣，可能隨時移位，更可能和我們過去的認識大不相同。這些方面已有人嚐試，¹ 更等待新一代的研究者投入。

邢義田

民國 90 年 12 月 24 日

¹ 請參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中國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目 錄

總序.....	李亦園	i
編者序.....	邢義田	v

主題演講

Ritual Vessel Changes in the Warring States, Qin and Han Periods.....	Jessica Rawson 羅 森	1
---	--------------------	---

論 文

古代藝術的區域性

Some Reflections on Sanxingdui.....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羅 泰	59
--	-----------------------------	----

時代與區域風格間的激盪：

西周青銅藝術風格的多樣性 及禮制發展大勢變因試析.....	陳芳妹	99
----------------------------------	-----	----

格套、榜題、文獻與畫像解釋：

以一個失傳的「七女爲父報仇」 漢畫故事爲例.....	邢義田	183
-------------------------------	-----	-----

中世紀的宗教與文化

南北朝觀世音造像考.....	李玉珉	235
----------------	-----	-----

北朝華嚴經造像的省思.....	顏娟英	333
Fazang and Śākyamitra, A Seventh-century Singhalese Alchemist at the Chinese Court.....	Antonino Forte	369

Ritual Vessel Changes in the Warring States, Qin and Han Periods

Jessica Rawson*

Introduction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changes in ritual vessel use. My principal claim is that during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Qin and Han periods, the bronze ritual vessels, dominant for over a thousand years, ceased to have a major role in tomb burials. Lacquers now supplemented those bronzes that survived. We see, in effect, a modernisation of the ritual vessels. In place of vessels in ancient shapes, the most common food and wine containers employed in ritual would appear to have been up-to-date pieces also used in everyday banquets. All our information comes from tombs. It seems likely, therefore, that the changes that I shall describe were products of major developments, not only

* Oxford University.

in the ways in which rituals were prepared and presented, but also in the ways in which the afterlife was conceived and realised.

The term “ritual vessel” here describes containers for food and wine at ceremonies, such as funerals, offerings at tombs, and banquets for the ancestors. During the Shang and early Zhou periods (up to at least 771 BC), they may have resembled vessels for ordinary, if high-ranking, banquets. These ancient examples were the ancestors of a long line of containers in bronze and ceramic copies. It is generally accepted, if far from proved, that the categories, such as *ding*, *hu*, *dou*, and *dui*, which lay in the lineage of the ancient ritual vessels, remained ritual vessels. Clearly many did, but probably not all. In addition, new categories of object were made in bronze that were not necessarily intended for the ancestral rites. At all periods, vessels in other materials — such as high-fired ceramic or lacquer — could also be used. Thus neither the type, nor the material, is a certain route to identifying a ritual vessel. Despite such uncertainties, scholars share a reasonable consensus as to what were ritual vessels down to, at least, the end of the fourth century.

What has been little considered is the way in which changes came about in the third century, ending the dominance of bronze categories.¹ I shall suggest that, during the fifth to second centuries

¹ Alain Thote has provided a very valuable basis for such a discussion in his account of burial practices in the south, see Alain Thote,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Chu Burials during the Eastern Zhou Period,” in Roderick Whitfield and Wang Tao (trans. and eds.), *Exploring China's Past, New Discoveries and Studies in Archaeology and Art*, Saffron Books International Series in Chinese Art and Archaeology, no. 1 (London: Eastern Art Publishing, 1999), pp. 189-204. A study of the south needs to be combined with analysis of other areas, most especially in the introduction of vessel categories that proved significant, notably flattened *hu* (*bian hu*), which may have been introduced from the northern borders and rounded-bottomed cauldrons, which seem to descend from *mon*, a vessel typical of the west, brought into the central states by Qin. This point is mentioned later in this paper.

BC, what we might call the everyday vessels of the time were drawn into the ritual practices. We must, therefore, take a view as to whether or not it is possible to distinguish ritual vessels from what one might regard as more everyday, secular dishes and goblets.

Modern archaeologists frequently separate ritual items from the everyday in archaeological reports, such as that on the tomb of the Marquis Yi of Zeng, discussed below. For example, bronze vessels and jade rings are deemed ritual items, while lacquer ear-cups and tables are described as for daily use. It is not clear that these modern categories accurately reflect those of the past. No doubt some such division did exist, but it was probably more complex and flexible than that usually adopted now. We know from the inventory in a fourth century tomb at Baoshan in Jingmen, Hubei province, that some wooden vessels were, for example, used in rituals.² Thus while it may be correct to view vessels in shapes that descend from Shang and early Zhou bronzes as ritual vessels, other types may also have been used in ceremonies and rites. Later in the discussion, I shall depend less on vessel shape than on the position in chambered tombs to identify ritual pieces.

We know that, from at least the early Zhou (c. 1000 BC), and most probably from the late Shang (c. 1200-1050 BC), some high-fired ceramics and some lacquers were employed, it seems, with the ritual bronzes. Thus the use of lacquer in itself is not surprising. The major changes in the late Zhou and Han period are the predominance

² Hayashi Minao, "Concerning the Inscription 'May Sons and Grandsons Eternally Use This [Vessel]'," *Artibus Asiae* 53 (1993), pp. 51-58. See also the Baoshan report, *Baoshan Chumu* 包山楚墓 [2 vols.] (Beijing 北京: Wenwu chubanshe 文物出版社, 1991).